

[德] 李峻石 (Günther Schlee) 著

How Enemies are Made

吴秀杰
译

历史已无数次证明，
对于事关人类命运的复杂局面，
能够具有鹰一样的锐眼去辨识世界的，即能够早认清
方向的往往是少数人。

Towards a Theory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何故为敌

族群与
宗教冲突论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德] 李峻石 著
(Günther Schlee)

How Enemies are Made

Towards a Theory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何故为敌

族群与
宗教冲突论纲

吴秀杰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 / (德) 李峻石著；

吴秀杰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3

书名原文：How Enemies are Made: Towards a

Theory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s

ISBN 978 - 7 - 5097 - 9711 - 2

I. ①何… II. ①李… ②吴… III. ①民族学 ②人类学 ③社会学 IV. ①C95 ②Q98 ③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3112 号

何故为敌

——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

著 者 / [德] 李峻石 (Günther Schlee)

译 者 / 吴秀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孙以年 孙美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10.875 字 数：25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711 - 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6 - 2392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by Günther Schle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李峻石授权的英文版译出

民族和宗教差异并非冲突的 根本原因（代序）

8年前，我在德国马普民族学研究所访问时，李峻石（Günther Schlee）先生送给我他刚出版的著作 *How Enemies Are Made*。该书文如其人，不讲客套、不绕弯子，没有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背景知识的烦琐叙述，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翻阅了几页，我就被他的观点所吸引。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没迎来和平，主要的变化只是各种冲突由以两种意识形态为旗帜改为以民族和宗教为旗帜。于是，学界中多数人和各国媒体都宣称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是不同人群的民族意识与宗教信仰的差异是造成各种冲突的主要原因。

在我自己多年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在对中国边疆地区一些民族关系问题的实地调查中，常感这样的观点过于简单表面，对问题的实质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因为我多年接触并熟悉的那些不同民族的人群和不同宗教的信徒，在日常生活的调查中细致地观察他们的言行，可以窥见他们对民族与宗教的真实态度，与外来者对其的述说有明显落差。也就是说，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和矛盾冲突中，民族意识与宗教信仰并不如书生们在自己的论文和著作中所描述的那么重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那么，在当今世界，是什么造成了不同民族与宗教信仰的群体

之间持续的矛盾与冲突呢？多年的实地调查使我认识到，对于矛盾甚至冲突双方影响更大的是各种实际的利益，如经济利益、政治权利、（个人和群体）社会发展的机会等。当今很多民族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界的学者都在围绕民族认同的强化、宗教信仰的对立、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之间的矛盾等问题来探讨分裂思想的来源、社会动荡的起因。从这些角度出发探讨如何淡化民族意识以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与社会的稳定。我常感这样的研究可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如何阐释民族、宗教与群体间的冲突？当今世界各种以民族、宗教为旗号的冲突，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一直在试图通过自己多年的调查搜集进行案例分析，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

拜读了李峻石先生的著作，深感其观点之尖锐与不同凡响。显然，在当今国际学术界对民族宗教问题的讨论中，他的观点属于少数派。但我们都知道，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对于事关人类命运的复杂局面，能够具有鹰一样的锐眼去辨识世界的，即能够较早认清方向的往往是少数人。

李峻石先生与我同龄，如今都已 65 岁。初次相逢，见他衣着随意，灰白的头发在脑后扎着长长的马尾辫。作为德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和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与周围那些温文尔雅的学者相比，他的做派给人一种桀骜不驯的感觉。读了他的文章，感到更加桀骜不驯的是他的思想和他对流行观点毫不留情的批判。他曾经跟我说，他有一半少数民族血统，他称自己本质上是个农民。

他认为，在当今世界，族群与宗教层面的差异并非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这是他在 30 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对冲突的动力机制及其各种复杂关联进行的提炼和总结。在《何

故为敌》这本书中，作者反驳了一系列成见，尤其是人们通常设想的“族群和宗教上的差异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战争与危机的主要原因”。作者提出一种“决策理论”，其目的在于解释哪些类型的身份认同在何种条件下才更容易成为优选对象，也就是说，包括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在内的各种认同都不是绝对的，都是人们在不同场景下生活的一种策略和方式。认同的目标是适应环境，更好地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

当前，各国媒体的报道经常说是族群和宗教的因素导致了国家的崩溃、内战的爆发和血腥的屠杀。而该书指出，族群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民族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实体，宗教的边界可宽可窄，宗教本身并非冲突的原因，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作者指出，纵观历史，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认为，宗教战争是为神学观点而战。与之类似，族群性也不是族群冲突的原因。

作者通过自己在非洲考察的各种冲突，总结出他的观点：族群性（ethnicity）是在冲突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有强制性边界、排斥性政治或者是在需要形成联盟时才形成的，这就是敌意的抬头。在冲突之时，人们对自己群组边界的划分要比其他时候严格得多。也就是说，族群性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作者认为，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每一个冲突都是争夺资源的战斗。作者并不完全否认冲突中社会与文化因素，即民族与宗教因素的影响，但认为这显然是第二位的。李峻石先生的调查主要是在非洲的各个民族、部落中开展，他通晓十种语言，还娶了一位非洲姑娘为妻，这为深入调查提供了可能。30 年的调查实践让他积累了大量极具说服力的案例。他说，从索马里的例子至少可以学到一点：族群多元化本身不是战争的原因，索马里的分裂与惨烈的内战令世界瞩目。

目，无疑是非洲最失败的国家之一，同时在族群和宗教意义上索马里却是最为同质的。与其相邻的肯尼亚，有 29 种语言和不同族群，但局势一直都相对稳定。

基于自己 30 年来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我得出了与他基本相同的认识。但我尚未把这么多案例归纳著书，而李峻石先生的著作已经出版了俄文、德文和英文版。

8 年前当我第一次读这部著作时，就希望有人将其翻译成汉文介绍给中国学界。现在，具有深厚德语和汉文功底，又有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吴秀杰女士将其翻译成优美流畅的中文，相信本书一定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深刻影响。

杨圣敏

于中央民族大学

2016 年 12 月 14 日

中译本导言

《何故为敌》的成书过程颇有些来历。它的初版是俄语版 (Schlee, 2004a)。2004 年, 莫斯科的俄罗斯科学院邀请我就冲突分析问题做学术演讲。我的讲座立足非洲的田野调查经验。俄罗斯科学院由瓦列里·季什科夫 (Valery Tishkov) 牵头设立一项意在对冲突境况进行早期预警的研究计划。车臣战争以及高加索其他地区的暴力冲突激发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当我用非洲的事例来描述冲突的动力以及冲突中的集体身份认同时, 一些听众开始窃窃私语: “他把我们和非洲人相提并论。”显然, 这里掺杂着某些微妙而敏感的东西。我自认为对冲突所做的理论化尝试是可以应用到整个人类上的, 无论是哪一种族和哪一地区。但是, 当俄罗斯不再是两极对立的全球秩序中的超级大国之一以后, 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新角色。有些俄罗斯人带着一种黑色幽默的态度看待有人将之与非洲进行的比较。不过, 此后还是发生了一些转变。

会议结束之后, 主办方向我提出可否将一些文本材料分发给参会者以及更大范围的公众。欧盟委员会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技术支持”(TACIS)项目也是该会议的资助方与合作主办方, 会支付俄文版的翻译费。我手头有不同的文章, 有些是德文的, 有些是英文的。我认为, 如果加上一些理论框架, 勾勒出各篇彼此之间的某些关联性线条, 这些内容应该可以变成一本书。于是, 我把用不同语言写成的文章整理成一份书稿。谢

尔盖·索科洛夫斯基（Sergei Sokolovski）是一位能流利使用德语和英语的学者，他本人也在研究类似问题，于是他就把书稿译成俄文。这便是我以俄文发表的第一部著作，迄今为止这也是唯一的（Schlee, 2004a）。

接下来，这部书稿中的英文部分由专业译者翻译成德文。按说我可以自己来翻译，但是对我来说，翻译自己写的文章太枯燥无趣了。我一直在开始写些新东西。于是，在专业译者的帮助下，该书的德文版问世了，略微添加些新材料并有所扩展（Schlee, 2006）。接下来德文部分被翻译成英文，书稿再次添加进一些新内容并进一步扩展，然后就有了英文版（Schlee, 2008）。

《何故为敌》的英文版也启动了 Berghahn 出版社的一套丛书“融合与冲突”，成为这一系列的开山之作。书中的基本研究方法被一些专著或论文集采用，当然这种应用既非教条式的，也非唯此独尊式的，而是结合那些可与之匹配的任何其他视角。我认为，对于一项研究和出版整体而言，该书提供了相当富有成效的内聚力，不同作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成果之间的可比性也得到了加强。

如今，吴秀杰完成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她和谢尔盖·索科洛夫斯基一样，也熟练掌握德语和英语。她的译本主要以英文版为基础，因为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完整的版本。杨圣敏教授的推荐，让这本书得以在中国出版。他在人际交流上的友善态度以及他对本书慷慨的溢美之词，让我对他充满了由衷的感激。

对于德国哈勒的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融合与冲突”团队的研究而言，本书也是一个基础性文本，在我们研究团队

(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其痕迹。在此以外,读者也许会感兴趣的是,在提出书中那些初始问题之后,我本人在这些问题上做了哪些推进性工作。

《何故为敌》是一种组合式构架:分析作为概念性实体的社会身份认同——由诸如语言或者宗教这样的标记和特征构成——与选择理论相结合。在哪些条件下,人们能对接受一种或者另外一种身份认同做出某种选择?是什么决定了这一选择?有些人会给出简单的物质主义答案。在冲突中选择站在某一方、加入某一或者另一党派,或者关系网络,这类自我认同循着金钱的流向。如果追随者与领导者具有一致的集体身份认同(族群、宗教、意识形态等),他们的忠心要价就会拉低;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领导者就得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或者使用更多的暴力。德-瓦尔(Alex de Waal)在其近著《非洲之角的真实政治》(*The Real Politics of the Horn of Africa*)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不过,话说回来,他提出这一理论只为阐释当下的非洲之角,并非为阐释那些在非洲之角上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所发生的情况。有某些阶段,真正的信念——它们或者正确,或者错误——指导着政治。但是,德-瓦尔发现政治以他所描述的那些方式变得“市场化”是个强劲的趋势。当“租金”为精英所掌控并向下分配时,即普通人依赖于精英而不是精英依赖于纳税人的安居乐业、创造力和产出力时,政治“市场化”的条件就形成了。这类“租金”也可能是对抗恐怖主义的价码。如果你支付钱财让某个国家来打击恐怖主义,那么你是在购买忠诚和支持,但是你永远无法完全成功。一旦恐怖主义被彻底清除,这个体系便无法再运作下去,因此可以确信的是,你的合作者会找到办法来把恐怖主义维持在一定程度上。

德-瓦尔的理论解释了世界上很多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这显得有些讽刺。将事情简化自有其魅力：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人们要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么就去问一下他们为此将得到多少钱。在周围的环境当中，你发现这能得到证实。在《何故为敌》一书中，我也描写了（索马里）各方力量的头领如何发动暴力行动，以便自己能受邀参加和平会议。这便是德-瓦尔所描写的那些逻辑脉络。为缔造和平而支付的“租金”维持了某种水平上的战争。

在我自己的理论阐述中，身份认同不仅能影响忠诚的价格。至少在某些个案中，它们也能成为真实的制约，其逻辑可能恰好相反。在裂变式宗族体系当中，在某一特定的社会组织层面之下一个人不可说：我想与之结盟的是甲本人，但是不要甲的“兄弟们”。一个人不得不将一个部族或者亚部族作为一个整体融合到联盟中，或者排除在外。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索马里的武装力量动员就遵循了一种“传统”部族的逻辑（全体亚部族的联盟，可能跨越了现时若干主要部族的分界线），不管被争夺的资源可能会多么“现代”（对发展援助的掌控、经济上的关键性资源、基础设施，或者总体而言：控制那人们期待着在动荡阶段之后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管暴力是如何被市场化的。

在完成《何故为敌》之后，我继续关注国家背景下的集体身份认同。我与阿卜杜拉·绍恩格罗（Abdullahi Shongolo）在2012年出版了两本书，讨论的是肯尼亚北部和埃塞俄比亚南部以畜牧业为主地区的行政秩序、区划和行省以及它们的边界线。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族群自决被纳入宪法，都可以观察到行政管理单元的细分化现象，而这种细分往往沿着族群的界线。

干旱条件下的畜牧业需要很大的可供迁移范围，在当地状况不佳时，需要能够进入那些平常为其他群体所用的放牧地区。过去曾经有过一些可以实行这种安排的机制，但在有了新边界以后，敌意经常出现，迁移活动受到限制。人们不禁要问，这类行政管理单元的细分究竟出于谁的利益。当然这不是为了有益于牧民或者肉类生产——肉类生产是这些地区的经济支柱，这里大部分地区只能用于密集型牲畜养殖，无法被用来从事其他形式的食物生产。一个现成的答案是，细分有益于“分而治之”国家层面上的政策。但是，如果再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正是那些当地政客和那群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在推进细分进程以及地区层面上具有族群性的缩微版民族主义。新行政单元意味着给他们提供更多职位。在这一关联背景下，集体身份认同不仅仅影响了“忠心的价码”。不管是否出于物质考虑，凸显这些集体身份认同及其差异——真实的和夸大其词的——对于一种行政管理和政治秩序取得合法性都是重要的。族群差异当中的一些因素，早已存在多时，并非仅为某一目的而发明。历史上，那些迄今为止未被与严格界定的地域连在一起的族群认同，开始遵循小规模西方民族国家模式变得更具有地域性了。我曾经称之为“族群性的地域化”（Schlee, 2013c）。

这个例子表明，对地方层面上国家代表造成影响的，很可能来自其管理对象的驱动结构，这与来自国家的有所不同，对前者有利之举可能会让后者付出代价。这就导致在存在国家行政的背景下，身份认同上一个更为普遍性的问题，包括与国家的认同以及被国家指定的身份认同。对此，我们只能就特定的国家、地区和国家类型给出答案。我们还远未有一种普遍性理

论。

在非洲东北部，族群和宗教标准似乎被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公民。某些公民更具有原型性，而另外一些则受到歧视敌对，因为他们没有显示出“正确的”特征。

我以苏丹为例（案例来自 Schlee & Elhadi, 2014）。在阿斯旺高坝（Aswan High Dam）建成之后，沿埃及边境的纳赛尔湖（Lake Nasser）在 1958 年至 1971 年间蓄水，努比亚人（Nubian）的农地被淹没。在苏丹边界这边，哈勒法（Halfa）周围的农民受到影响。他们在苏丹东部的哈什姆吉尔巴（Khashm al Girba）大坝之下建立了新哈勒法居住地，得到了大块灌溉地作为补偿。农民失去的土地得到赔偿，并可以换个地方继以为生（Sørbø, 1985）。2013 年，罗赛雷斯（Roseiris）附近的青尼罗河大坝加高完成。这里位于纳赛尔湖以南 1000 公里的地方，与南苏丹（自 2011 年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接壤，也与埃塞俄比亚接壤。当新大坝后面的水库开始蓄水时，由于地处平坦的冲积平原上，大面积土地被淹没。情况很快就明了了：许多农民不能在其他地方得到土地作为补偿，尽管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钱和一些房基地。岸边的大块土地没有划给那些动迁的农民，而是给了大公司。政客们赞扬这一“发展”，因为它能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人们可以去讨论，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农民变成了现代机械化农业当中的雇佣劳动力。但是，在这一“身份认定”背景下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似乎是一个无须质疑的问题：青尼罗河的农民可以变成雇工，而在比这里靠北、位于埃及边界线上的早年个案中，农民就可以得到土地赔偿并继续当农民。也许那是因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人口数量要少于今天，资源竞争不那么激烈。但是，人

们也有理由这样怀疑：苏丹政府（自 1970 年以来政权频繁更迭，假如人们还能从中看到连续性的话）把努比亚人视作“真正的”苏丹人（毕竟，大多数北方苏丹人都是努比亚人后裔，不管那些阿拉伯化的谱系声称如何），而罗赛雷斯以南的农民则依据其地区和族群的起源被认为是“南方人”“埃塞俄比亚人”“乍得人”“西非人”。^① 在这里，身份认同似乎在起作用。决策者感觉自己与北方人更近。这与从被包括进宽泛身份认同人群中所获的物质回报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政府代表可能认为，努比亚人将在政治上支持他们，并可能怀疑罗赛雷斯以南的人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的同情者。真实的和想象的肤色差异——人们用从“棕”、“红”到“绿”以及“蓝”等不同专有词描述，肤色在苏丹也是社会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国家，人们对种族主义并不陌生。

这与人们从常理上会指望政府对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予以特殊优待的想法完全相符（假定政府的确会对人予以区别对待，尽管从规则的角度看他们不应该如此）。然而不完全明了的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领导层是否总会与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有认同感。他们也许会有一个理想中的“人民”，一种人应该是怎样的愿景，他们自己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设想。灭绝人性的种族主义“纳粹”政权将许多形式的跨族群婚姻视为犯罪（他们称之为“跨种族婚姻”，因为这是基于理解有误的生物学而不是文化），然而他们不光容忍，甚至鼓励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婚姻，后者被认为是更为纯粹的“北方人种”，在某种意义上比他们自己这些日耳曼人品

① 在毗邻的加达里夫（Gedaref）州也有着类似的区分。参见 Zahir Musa al-Kareem, 2016。

种更为优越。^①从理性选择角度人们会以为，行动者会青睐自身或者与自身最近的人群，这可以被看成过头的种族主义者做法，这种做法更青睐的不是种族主义者自身，而是另外一些人：种族主义者用来定义自身的那些特征，其更为极端的形式出现在这些人身上，因而种族主义者对他们的青睐更甚于自身。

苏丹的上层精英强调他们的阿拉伯起源，他们将这与浅肤色划等号。这种对等当然是有争议的。对此持有批评观点的苏丹人指出，现代埃及人的祖先大多是古埃及的斐陶那人（Firavun）（字面上的含义是“法老们”，指那些在法老时代就已生活在埃及的人）。人们当然也可以提及希腊人、罗马人、突厥人以及其他人来解释现代埃及人的外貌。尽管这些都可以说得通，但是从一些苏丹人的视角来看，埃及人代表他们想如何让自己变得更纯粹这一理念。

尽管苏丹人之间对土地的争夺日益强化，据 2014 年 12 月 13 日埃及《每日新闻》的说法，苏丹政府向埃及小型农民提供了 1 万英亩可灌溉的农地。按照其他消息来源，所涉面积为 10 万英亩。政府给出的理由全都是关于团结（“苏丹和埃及是一个国家”）和发展（“埃及农民有了了不起的农耕经验”）。^②如果人们知道在“真正的”苏丹人当中通行的那些日常族群式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其指标是：肤色在婚姻市场上的角色、咒骂用语、就业机会），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一举措的隐含目标是

① 关于对种族/族群/身份认同语义场的梳理，并试图给其带来一些秩序，参见 Banton, 2015。

② 引自 www.dailynewsegypt.com/2014/12/13/；www.africareview.com/News/Sudan-offers-Egypt-farmland；www.news.sudanvisiondaily.com/details.html?rsnpid243584，最后登陆日期：2014 年 12 月 24 日。

高看那些埃及农民。这一个案便是对自身的群体不予接受，希望将其改造成别的样子。这里描写的政策都是在集体身份认同名义上发声和行动，行动者的归属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而其他人则将其代表得更为纯粹。这是一种重心在自身之外的身份认同。

权力在握的人和一般人一样，倾向于出于个人利益来采取行动。他们的决定似乎经常是建立在精心的成本 - 收益分析之上。不过，有很多办法来避免通透地考虑问题。一个人可以接受习惯式解决途径，或者接受他人的建议。也就是说，本能和感觉倾向于引导我们做出于我们有利的决定。我们的大脑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在我们没有明确意识到时替我们做很多成本 - 收益的核算。大脑告诉我们避开疼痛、填饱肚子、找到合适的伴侣、寻找可能有用的朋友，以及许多其他无须多虑的事情。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永远开启着的成本 - 收益计算器，不管我们（我们的主观自我，我们的亲历经验，我们的明确意识，我们头脑中的影像）对此是否进行记录。

但是，只有理性选择最为基本的模型才是严格强调个体的。为了取得固定的报酬，我们也可能为他人谋划（计算他们，而非我们的成本和收益）。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是“主子”的“代理人”。我们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这并非绝无仅有。我们大多数人在做出重要决定时，也会从家庭角度出发并考虑家庭的利益。如果我接受了另外一座城市中这份有吸引力的工作，我的孩子会去哪里上学？对于找到一份新工作/交新朋友，我的配偶会说什么？诸如此类。换言之，在最简单的理性选择模型当中，个人是自利式成本 - 收益分析的参照点；如果我们要搭建真实生活的模型，我们对参照点的理解就得扩展。这被我们